
从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看佤族妇女地位的变迁

杨牧原^{*1}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 北京 100024)

【摘要】:对佤族女作家董秀英小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的细读,大概可以还原三代佤族妇女在自然环境、生产关系和男权社会三重压迫下所遭遇的生存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佤族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佤族妇女获得解放的核心在于生产力的解放,只有当佤族地区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佤族妇女才可能在思想和行为得到根本的解放。

【关键词】:董秀英; 佤族妇女; 地位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7)04-0051-05

1949年出生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董秀英是佤族的第一代大学毕业生,她通过对保留民族记忆的佤族口述史的记录的再阐释,撰写了反映20世纪50年代以前三代佤族女性生活和抗争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使我们对于那个时期的佤族社会和佤族女性的社会生活状况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董秀英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她对佤族妇女的美丽和勤劳充满赞美,对佤族妇女遭受的苦难怀有深切的悲悯与反思。董秀英特殊的经历,佤族的身份和自觉的女性意识,使她的小说成为了研究佤族妇女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命运的最佳样本。而为了更好的解读出其中蕴含的女性声音,最为适用的就是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即从性别的视角去重新解读和建构文本。但正如研究者反复强调的,身份主义的解读,往往会使文本和历史碎片化。因此,应该采用统和性的理论加以整合与补充。同时,所有女性的历史又应该被视为更大社会变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佤族地区这样社会生产相对落后的地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于人们生活的制约和影响几乎是决定性,因此在本文中我们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策略来看待佤族的整体社会变迁。正是在这两种理论视角的交叉和呼应,本文通过对《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文本的细读,来考察和展示佤族妇女在这段历史中的地位变迁。

一、《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时代背景

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记录的是佤族三代女人的经历,时间跨度大致上从民国到解放初。这一时期的佤族社会开始从原有的封闭状态,^[1]开始逐渐的和外界相接触,当然这种接触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直到最后1951年佤族地区解放,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而这几十年所经历的,恰好也是中国社会经历巨变的时期,不论是在经济、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上主流社会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必然会以自己的方式对佤族社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

二、三代女人的命运与佤族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

¹作者简介:杨牧原,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

小说很有特点地选择了祖母孙三代女性的命运，这样的言说方式一方面使不同时期的女性得以发声，另一方面通过血缘的连接，使人们体认到女性的命运是历史的形成，每一个女性的境遇都是建筑于之前女性的抗争与努力之上，这就非常明确地体现出了作者的女性意识。而这种以时间进程为主要线索的结构也非常适合用于分析社会的变迁。

（一）第一代女人叶嘎的命运

叶嘎的父母一开始是为了躲避汉兵而逃到马桑部落的位置的，叶嘎在马桑部落随父母长大后，父母便去世了，这也为之后叶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到了婚配年龄之后，叶嘎接受了一个住在山上的佤族小伙子（这个佤族汉子的名字从未出现过）的追求，后来叶嘎的丈夫在狩猎中不幸离世，之后叶嘎在山中生下了遗腹子娜海。因为传统习俗，叶嘎不得不改嫁给了他丈夫的兄弟。他的第二任丈夫抽大烟好吃懒做，叶嘎不得不为生活而劳碌，而在一次劳作中她不幸被雕袭击离世。

叶嘎生活的时代，最大的特点是经济发展程度很低，自然对人的威胁仍然很大，她受到的压迫主要来源是自然环境，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男权社会。

1、第一代女人叶嘎受到的压迫

（1）自然环境带来的压迫

自然环境带来的威胁，从叶嘎尚在襁褓中时就已经开始了。叶嘎跟着父母躲避兵祸的时候，就曾经遇到过：“一只过山虎随着果子的香味走来。阿佤汉子拉着婆娘，躲到一棵大树后面。老虎低着头吃果子。吃饱了，抬着圆鼓鼓的肚子，懒洋洋地走了。豹子扬着头走来。用前爪扒去老虎吃过的果皮，一个接一个地吃着熟透的果子。逃难的这家三口人，悄悄地躲在一边看着。”^[2]叶嘎的第一任丈夫也死在狩猎过程中，“太阳躲进山脚的时候，在一个山凹里找到了她的男人。他睡在水草上，肚皮被野牛角挑开了。肠肠肚肚一大包地露在外面，他断气了。”^[3]叶嘎最终也死于野兽袭击，“娜海和大家赶到阿妈面前时，阿妈说不出话来，她脸色白咋咋的，身上留着带血的老雕爪印。部落里的长老、魔巴，来给阿妈叫魂撵鬼。阿妈没有睁眼，她在火塘边的竹篾床上，睡得熟熟的。阿妈走了。”^[4]

云南佤族部落的聚居地在中缅交界处，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非常靠近热带的部分，野兽众多，甚至部落本身都会受到野兽的威胁，这使得佤族的安全和食物有赖于猎人的存在。而这种情况野兽造成的死伤也偶有发生，因此以上文本中记述的故事实际上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女性由于身体的原因和对自然感知的敏锐，她们对于自然环境的压迫有更深切的痛感，之前的描述，从女性的视角将这种自然的迫力形象的展示出来。

（2）落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带来的压迫

说到自然环境带来的压迫，就不得不提社会生产力对人的影响。生产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从根本上决定着女性的社会地位。佤族的农业活动，一直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佤族人必须依靠狩猎和采摘来补充食物。“阿佤人世世代代靠着老林生存。从阿佤人的祖先开始，他们全是靠男人跟野兽打斗。男人们打死野兽，把兽肉拿回家来，养活全家老小。女人们在老林里不但打不过野兽，反而被野兽伤害。就连猴子这个小东西都来欺负女人。”^[5]叶嘎的丈夫就死于给怀孕的叶嘎狩猎野牛，叶嘎最终是死在做农活的路上。农业生产力的低下，加之男性在社会分工中更多的承担了狩猎的角色。使得在西南地区，地位较低的妇女来进行农业劳作成为传统，男性是不干农活的，且女性在几乎所有文明中都是家务劳动的承担者。而农活加上家务活动在繁重程度上远超男性的狩猎活动，这种男性做更有“价格”的社会劳动而女性做繁重而不被看重的劳动的方式，事实上形成了男性对女性价值的剥削。后来叶嘎被迫嫁给的第二任丈夫是个大烟鬼，但由于女性传统分工是农活，所有的工作都压在叶嘎的身上，还要负责给丈夫种大烟。在这样的关系里，叶嘎的丈夫完全脱离了劳动，形成了对叶嘎纯粹的剥削。至于叶嘎被迫种来与自身毫无关系的大烟行为可以被看做是异化劳动，她和她生产出来的产物

已经毫无切近感。

(3) 男权带来的压迫

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男女双方都必须时刻担心着自然的威胁，由于社会分工的原因，女性在佤族社会通常从事农业活动比男性更加没有能力面对外界环境的威胁，这使得女性在面临外界环境压力的时候地位将低于男性，承受双份的压迫，甚至被认为必须依附于男性才能养育后代。

叶嘎在父母过世后，曾遭到男青年的骚扰。男青年在叶嘎摘枇杷的时候抢她的果子，用言语调戏她，这中粗暴说不上是自然的追求，而是男性表现出来的对女性的威胁性，是对女性的一种压迫。这种直接的威胁性使得叶嘎在受到心仪的男青年的追求的时候，误会而做梦是野人想来抢她去做媳妇，病了一场，这表现了部落环境下，或者说男女性自然状态中女性对于男性的弱势地位。

而在她的丈夫过世以后，叶嘎不得不按照习俗嫁给他故去丈夫的兄弟，这其实是在原始私有制分化后女性被视作男性家族的私产而失去了人身自由的表现。这时女性的地位事实上处在仆人的地位，这已经与分工无关，即使男性完全不从事劳动，女性也必须依附于男性。叶嘎的第二任丈夫不从事任何的劳动。而叶嘎要负责农业种植：“收完小红米，撒苦荞，年复一年地栽种着她和汉子一起开挖出来的这块火山地”^[6]，同时还要负责丈夫的大烟，“分出来了一半种大烟”^[7]。在第二任丈夫组织人抽大烟的时候“叶嘎娜海只能蹲在门口。”^[8]兄弟在娶死去丈夫的女人后，是不能丢弃以前的孩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养育后代的考虑，但这为接下来娜海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2、第一代女性叶嘎的地位。

从之前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以叶嘎为代表第一代佤族女性受到三重压迫，一重是自然环境带来的压迫，一重是落后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带来的压迫，一重是男权社会带来的压迫。这一代女性身处生命受到威胁，处于生活极度困苦的仆人地位。

(二) 女人娜海的命运

娜海亲生父亲在她尚未出生就去世了，从小就开始需要帮她的母亲叶嘎背水煮饭了，母亲也在娜海成年(到出嫁年龄)前去世了。娜海因为害怕蛇，猴子的传说而想要嫁给帮助了她的岩块，她认为“一个女人在是难得活下去的”^[9]。但最终被他继父卖给了她并不爱的岩经，她一直受困于要给岩经生个儿子，挣扎了很久生了儿子，但生活仍旧非常苦难。后来从汉人那里学来割头祭谷子的人来到部落，并且凭借更多的牛当上了头人。每年要收他们很高的人头税。娜海的丈夫岩经只想要男孩，加之解放军将要到达部落的消息。娜海只得选择抛弃小女儿妮拉。

1、第二代女人娜海受到的压迫

(1) 自然环境带来的压迫

娜海生活的年代随着火枪等物的进入以及马桑部落扎稳脚跟，自然环境虽仍具有威胁性，但带来的压力已经小了很多，很少能对人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娜海的朋友曾经因为蛇得病去世了，娜海被猴子抢过包谷，还听说过猴子抢女人的故事，这里有明显的不同的就是之前叶嘎的丈夫是被野牛顶死，而这里朋友是死于间接的生病。叶嘎梦见的是野人，而娜海恐惧的只是猴子。后来娜海的黑狗曾被豹子咬死，且过了不久就被部落里的猎人拿着弓箭，火药枪，大规模出动去猎杀了作为潜在威胁的豹子，这时佤族部落其实已经基本排除了猛兽的威胁，但之前叶嘎小时候直接面临的是老虎豹子，丈夫死于野牛。佤族部落是没有能力完全打退猛兽的，作为猎物的野牛也不再出现，娜海的丈夫打猎物只限于麂子老鼠。猎物代之以家畜，后来红包头带来的黄

牛就是其中的代表。娜海因为自然的威胁想要嫁给能打猎的岩块，而父亲把她卖给了家里有牛的岩经。这就是随着生产力变化，自然威胁下降的一个重要的体现。生产力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化。

(2) 生产力生产关系带来的压迫

娜海这一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男性狩猎女性负责农事的传统并没有变。由谷子取代了荞麦等作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但男性从事狩猎，女性从事农事的分工并没有变化，没有让男性代替女性从事更多产出的农事，从事农事的女性并没有因此低位变高，反而承担了更多的劳动。

另外一个更为特殊的事件就是因为改种谷子，带来谷子的“红头巾”成为了头人，他收取比以往高得多的人头税，高昂的人头税使得即使丈夫岩经也努力打猎，娜海还是养不活自己的孩子。这其实是从原始部落的生产关系向封建生产关系的转变，娜海和他丈夫就算不得不抛弃孩子也是无法反抗的。娜海甚至包括她的丈夫，事实上处于封建社会贫农阶级的地位。

(3) 男权社会的压迫。

娜海首先受到的直接压迫来自于他的继父，她从小就受到继父殴打虐待。“后爹打够了，用绳子捆着她，拖回了家。”^[10]在小时候她就不得不开始做活种田养活她的继父，受到猴子惊吓以后想要嫁给救了她的岩块。但继父却把她卖给了岩经做媳妇。

在被迫嫁给岩经之后，她受到的压迫就来自于丈夫岩经，她努力伺候岩经，却被岩经视为生育儿子的工具。“娜海这样地伺候汉子，汉子每天回到竹楼上，总是嚼着苦涩的槟郎，低着头不说话。”只有在娜海要生孩子的时候，岩经才有了“一层淡淡的笑容”^[11]但看到娜海生下的是女儿的时候，岩经“把娃娃往婆娘怀里一丢，匆匆奔出了家门。”到了她终于生了儿子以后丈夫也完全不把他的劳动当回事，跑着告诉他人而“娜海的脸上，身上滚动着大颗大颗的虚汗。她小跑着跟在岩经后面，脸上眯笑眯笑的。”^[12]娜海在家中充当仆人的同时还被剥削了生育这一重要的“人口再生产”的价值。这不是娜海在自然状态下想要的生育活动，因为她生下来的女儿妮拉在她极为不情愿的情况下被选择抛弃了，这是违背母性的。

在佤族地区解放以后，她甚至转变成了压迫女儿妮拉的的一份子，压迫着妮拉不让她出去上学。娜海本身也没有真正从丈夫附庸的地位中真正解放出来。

2、第二代女人娜海的地位

娜海的地位是有变化的，她从父亲的私有财产加变成了丈夫的生育工具和仆人，在封建制度的雏形(红包头做头人的时期)成为了贫农家中的仆人。而在解放后娜海的命运稍有好转，从封建生产关系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却因为主观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仍然没有摆脱仆人的地位，独立地成为自己的主人。源于生产力上升带来的变化，娜海的地位是比她的母亲叶嘎有所上升的，虽然她仍受自然的压迫(猴子、豹子等)至少她生命没有时刻受到自然环境的威胁。但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压迫和来自丈夫更加冷漠的对待，她从事的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和人口再生产的劳动事实上受到了更加沉重的剥削。

(三) 第三代女人妮拉的命运

妮拉曾在刚出生不久被父母一起过，后来佤族部落发现解放军是好人又重新回到了马桑部落，而妮拉也回到了父母身边。父母想要把她嫁给岩林，但妮拉喜欢岩嘎。妮拉想到在长老和李老师的帮助下到了寨子里的小学上学，并且收到了初中录取通知书。她受到了父母的阻拦，但却趁着母亲娜海不注意，自己跑出了家前往城里读初中。

1、妮拉受到的压迫

(1)生产力的压迫

妮拉这一代人，自然环境已经完全对佤族人形不成威胁了，事实上除了交通落后导致的封闭外，云南佤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可以用非常优渥来形容，植被丰富，水热条件良好，各种作物都可以在此良好地生长。解放军进入佤寨，带来了先进的意识和新的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力的发展仍然面临很大困难，妮拉想看小人书，接触外界环境只能靠偶尔进城的岩嘎带回。考试的钱是寨子里的李老师偷偷给的，拖拉机只存在于传说之中，可见当时佤族的物质生产仍然是比较落后的。而妮拉父母岩经因为想要让妮拉帮家里干活而不让妮拉考初中就有生产力不足的原因，“进城读书，不能帮家里干活”^[13]。佤族到今天为止，义务教育的完成率仍然很低，可见要帮家里干活而辍学是到今天为止仍然很常见的问题。但生产力不足造成的压迫也轻微了很多，妮拉不再面临饥饿，妮拉的父母也不再面临受封建制度盘剥时担心养不活妮拉的问题。

(2)男权社会的压迫

妮拉生活的时期虽然佤族也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但是妮拉和她的母亲在父亲面前仍然没有发言权，解放前娜拉不敢在丈夫面前“多活一句话”^[14]，解放后还是不敢，比如父亲训斥母亲“莫多嘴，摆饭吃。”^[15]妮拉自己只能采用偷跑的方式来反抗。妮拉也没有摆脱来自男性的骚扰，曾在打闹中被其他男孩脱掉了衣服，还在之后被岩林强迫嫁给她做老婆，好在最后都被岩嘎救下。

事实上妮拉所处的时代，父权并没有真正失去原有的权威，比如帮助妮拉去上小学的岩坎阿公，作为村子里的长老“他说的话，就像老天爷的命令一样”其实仍然是父权的代表。只是由于新思想的进入(比如教书的李老师在村中就很受尊重)，父权变得更加开明了。

妮拉受到男权的压迫从结果来看，远远少于她的祖母和母亲，这源于她自己的反抗:逃走去考试“教妮拉的李老师给了妮拉五块钱、五斤粮票，她悄悄地去了”^[16]，第二次则是趁母亲去买东西，自己跑进城去上初中了。也更来源与其他人的帮助，岩坎阿公的帮助，李老师的帮助。还有不可缺少的由新时代带来的受教育的机会。

2、第三代女人妮拉的地位

妮拉不再面临自然环境的威胁，虽然物质生活不算充裕，但也足够维持，且不再受到不合理生产关系的压迫，加之在他人帮助下，妮拉暂时地逃离了父权的掌控。生活虽然贫苦，但妮拉是第一代取得了独立人格的佤族妇女，开始有机会掌握自己命运。

三、三代女人地位的变化与佤族女性解放面临的问题

第一代女性叶嘎，她深受自然环境，落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男权社会的压迫。她处在一个几乎是生命受不到保障的奴隶的地位。在第二代女性娜海的人生中，因为生产力的进步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她虽然不再直接受生命威胁，却其实在整个社会阶层中处在了更低的位置上。而第三代女性娜海，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受益者，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活动的一个特点就是用直接强力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拉平男女差距(比如想办法一定让女性一起上学，妇女能顶半边天，公分同等计算，妮拉阿爸出一天工结一个疙瘩，阿妈则用竹片刻一个印)，再对妇女弱势的地方进行政策补助，比如妇联，产假等。这些政策对妮拉的地位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提升，免除了很多家务劳动，而获得了和男孩同等的读书的地位。再加上妮拉有着祖母和母亲都没有的自主的反抗意识。这使得妮拉摆脱了作为男性附庸的地位。

西南少数民族女性解放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佤族女性也是如此，到了今天，在佤族村寨主要从事农业活动和劳作的仍旧是女性，在家庭中男性地位明显高于女性，男性对财产有更大的支配权。加之教育资源不均衡，佤族的受教育程度仍然很低，

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很难得到。加上重男轻女的现象严重，家中女孩早早开始干活，男孩才有更多的机会去读书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佤族当中。董秀英作为佤族第一代大学生，她认为第三代女性妮拉可能的出路是读书。但读书改变命运对于佤族村寨来说毕竟是少数。

要真正提高佤族妇女的社会地位，最重要的进一步加快当地的经济的发展。佤族地区交通落后，物流不畅，边境贸易得不到很好的发展，矿产储备也难以有效开发。佤族地区由于传统文化保存较好，适宜发展旅游业，并已修通了机场。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佤族村民的收入，减少了佤族村寨女性从事农业活动的压力，而游客和旅游行业外来从业者的进入，也对佤族更好地接触外界带来了机遇，佤族人想要读书和走出去的想法比起旅游业发展以前不可同日而语。而佤族妇女由于性别优势，可以更好的参与到导游，出售佤族刺绣等手工艺品等经济活动中，有可能获得超过男性的收入，这使得女性的地位有了很明显的提高。但旅游业并不足以真正成为佤族社会的支柱，大部分佤族人仍然主要靠农业为生。

其次，由于佤族民众法制观念的相对淡薄和传统力量的强大，各种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政策，比如义务教育的落实，几乎都是依靠基层工作人员的一己之力加以推进，效果并不良好。而像重男轻女之类的传统观念，在短时间内还不可能产生根本的改变。女性日常权益的保障更多的是依靠妇联等组织的支持，其自觉意识和社会支持都还有待加强。

不论是加速经济发展，还是提升妇女社会地位，客观都需要加强佤族社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增强佤族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流动性，这也是现代性的根本指向之一。而当前佤族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佤族女性的权利保障和地位改善，必须要融入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之路，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来，才能得到真正彻底地解决。

注释：

[1] [美] 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王晓毅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 年版。

[2] 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00 页。

[3] 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15 页。

[4] 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20 页。

[5] 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34 页。

[6] 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49 页。

[7] 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17 页。

[8] 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17 页。

[9] 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26 页。

[10] 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32 页。

[11] 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33 页。

[12] 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35 页。

[13] 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49 页。

[14] 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33 页。

[15] 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1991 年版，第 153 页。

[16] 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49 页。